

# 抗战损失问题研究的区域研究基础构建

## ——读《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卞修跃

—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但这场战争在中国国土上持续时间之长久、展开规模之巨大、武装对抗之激烈、波及区域之广阔,在近代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劫难,使中国遭受前所未有的人口伤亡、价值难以数计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损失及文化遗产的毁灭。

战后迄今近 60 年间,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一个难题,即是有关中国抗战损失的研究,亦即有关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的社会物资财富损失及人口损失的研究。难题之难者,是作为这一专题研究之基础的资料保存、发掘、整理、出版等方面工作一直没有充分展开。与此密切相关,则是因资料的缺乏所导致的专题性基础研究的成果严重不足。此外,研究者关注程度的不够也更促成这一领域研究之薄弱局面的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抗战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损失研究,更因资料分散、研究难度巨大而长期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当抗日战争研究重新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时,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一方面集中

于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传统研究领域,同时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驳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行,一部分学者开始着重进行诸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与毒气战、强制劳工等方面日军暴行的专题研究。但于中国抗战损失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及进展相对于上述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均显薄弱,不足与该专题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所具的重要性相适应。由此,当抗战史研究者无法回避中国抗战损失时,便往往采取粗疏估计、笼统叙述的方法,以寥寥数语作简单的结论性交待。但这些结论性交待因缺乏充份的资料支持和严密论证,合理性往往遭到人们的质疑。当国家相关部门在处理特定国际关系问题不得不涉及这一问题时,往往又由于采用了这种通过粗疏估计得来的结论陷于被动。

不过,在最近数年间,在这一专题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明显变化。一方面是相关的基础性档案资料逐渐被发掘出来,使人们有可能据以进行相对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关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专题论文和专著已能偶尔一见,表明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对此问题的粗疏估计,而欲作深入认真探讨和严密论证的意愿。另一方面,现代史学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方法理论也开始对抗战史研究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人们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开始由定性研究逐步过渡到定量定性相对合,甚至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方法。研究者在确立研究专题时,也不再仅仅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传统史学研究的几大块专题上,研究专题的选择呈明显细化的倾向。这样,以往很难进入人们研究视野的许多专题得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往昔人们觉得缺乏研究基础、研究难度较大的专题,由于视角与方法的变化而日益受到人们的注重。就中国抗战损失而言,基础史料的初步发掘、人们认识的进化、定量分析乃至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协作

的研究方法的介入,以及前人传统研究成果之转化为本课题专题研究的基础,使得深入具体地探讨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能。

作为这种变化明显表征的,是最近几年来出版发表的几篇有关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专题论文及几部有关中国抗战损失区域研究的专著。其中一部即是袁成毅教授最新出版的专著《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一书。

## 二

当人们涉及到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往往以笼统估计或干脆避而不论时,《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作者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深感于“到目前为止的战争期间伤亡人口的研究基本上不是建立在各省区统计的基础之上,因此,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人口伤亡 3500 万的说法总是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有鉴于此,开展对区域战争损失的具体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进而确立以浙江省抗战损失为研究对象,由区域研究入手,著成此书。

我们不能不说作者的学术见地与勇气是十分令人钦佩的。正如当年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机构主持进行抗战损失调查时须由各省市县级政府分别组织进行查报、层转汇总一样,研究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同样亦应建立在具体的、分区域的、分专题的研究基础之上。只有当学术界取得有关中国各省、市、区的各方面抗战损失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后,才能构建起中国抗战总体损失的数据基础,舍此法门,别为他途。我们不能企望面对一个涉及空间和时间范围巨大的专题研究,通过估计或定性的论述得到准确的解决,而必须沉心静气,条分缕析,把大的问题分析为一个个具体的、细小的问题,利用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和合理的方法,逐个地、耐心地各

个击破,从而为根本解决一个大的专题研究构建起基础。中国全面抗战八年,所受损失空前巨大,涉及范围广阔。从大的方面说,可简单分作财产损失与人口损失。从小的方面而言,财产损失又可细划为各项社会事业、各项公私财产的损失;人口损失同样可以军民、男女、老幼等不同主体来划分,也可以直接、间接的伤亡形式来划分,还可以区域分布来划分。纵横经纬,中国抗战损失专题研究本身即呈现一个庞大网状结构,结点即是一个个具体的细小问题的核心,结点之间的连线正是各个具体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归而总之可喻为网纲,亦即是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常谓“纲举目张”,其实无“目”则亦无所谓“网”。但在以往学术界就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的探讨中,研究者或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或出于该专题研究基础的薄弱及难度的巨大,“举纲”者多而“张目”者寡,遂于无形中形成此问题认识的粗疏笼统与缺乏严密论证。

通过对微观资料的充分发掘与利用,进行相对细致的区域性探讨,藉以深化历史问题研究,提高人们的历史认识水平,在近些年社会史、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渐成一种趋势,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内也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这一方面显示着研究者更具耐心,研究对象更加细化,学术界对研究规范的更加注重,同时也显示了研究者更趋于务实耐心的心态、敢于正视难题的勇气与勇于解决难题的信心的增加。面对着繁若乱丝的中国抗战损失问题,《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的作者即表现出了非常平和的心态,他并没有好大喜功地奢望一次性解决全部疑点与难点问题,也未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相关问题下一定论,而是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了非常适度的定位,既明确意识到以一人之力无法全面解决如此庞大繁杂的难题,也不甘于流落于人们在涉及中国抗战损失问题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不可估量”、“难以数计”等模棱不定的说法,而是怀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据自己的研究视野所及和所能掌

握的可靠材料基础,进行其自谦称为“一小步”的具体的、区域的、量化的研究,以期从对作为一个庞大网状结构的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的一个点的层面即浙江省抗战损失问题,进行实在的探讨。作者自己认为,笔者同时也认同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最终解决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当《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摆在读者面前时,人们会发现作者务实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可敬的勇气、卓越的学识与缜密的分析对同领域的研究者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以笔者所见,以类似的方法作同类型研究的学者,除 2000 年 10 月黄菊艳以中山大学博士论文的形式提交的《损失与重建——抗日战争与广东经济》及其在此后发表的同专题论文外,目前在国内的抗战史研究学术界尚不多见。虽然黄菊艳博士论文的视角与袁成毅教授研究专著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探讨的重点与范围也不大相同,但从研究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的角度出发,其区域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恰具有异曲同工之趣。当今天学术界猛烈抨击“如果史学”之际,我们冒险作一假设:如果今天全国有二十多位抗战史研究专家,怀着与本书作者同样心态与务实精神,不辞辛苦、耐心细致地对抗战期间除新疆、青海、西藏之外的曾经遭日本侵华战祸的各省损失作同类的研究,或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具体时空范围内的中国抗战损失问题进行可靠的量化分析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整合局部研究成全局性成果,则离我们解决中国抗战损失问题便为时不远了。且基于区域研究与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可信度,肯定较于笼统粗略的估计与缺乏论证的臆测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 三

中国抗日战争损失问题研究,其基本核心主要涉及到两个方

面的数量问题:损失的财产数量及伤亡的人口数量。欲很好地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只依靠传统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引入量化研究的方法。而量化研究的前提,则是研究者必须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以求相对完整地发掘利用档案文献及其他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梳理头绪,订正讹误,补充缺失,以构建研究的数据基础。有关某一省区之损失问题的研究,同样也不能例外。《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之全书内容的核心及作者研究工作的成果,也恰恰体现在这一方面。作者从浙江省内的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典藏档案,以及地方史志及时人日记等文献中,爬梳出大量的可靠资料,构成其研究的基础,对抗战期间浙江省境内战事情形、各县沦陷经过及程度、日本侵华当局在浙江省的军事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以及浙江省战时金融、工业、交通、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及人口等方面的损失进行了系统的、具体的考察与研究,其在每方面做出的结论都建立在相对具体的、有根据的数据统计基础之上,基本上打破了以往人们只作定性评述的窠臼,从而保证研究与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比如作者利用档案记载、时人日记及新修史志等方面的资料,对战时浙江省近70个市县的人口伤亡损失最低限数进行逐个考察,得出浙江省抗战人口伤亡损失最低限数为34.4万人,应该说这个数字基本上反映了作者考察所及,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可信度的、有案可据的浙省战时人口损失情形。此外,作者于浙江省抗战时期经济损失的各个方面,也都凭借着大量档案数据文献,进行了具体的演算分析,得出基于原始数据统计基础的定量结论:直接工业损失以1945年底法币值计共达392亿元,交通运输方面(不含铁路损失)达136亿元,教育文化损失达334亿元,农业损失2056亿元,桑蚕损失821亿元,渔业损失4560亿元,各项公私损失有据可考者共达8301亿元。其各项结论均建立在切实可据的档案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极具可信

度。至此,书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的具有坚实的统计数据基础、充满实证研究之理性的有关浙江省抗战八年间财产损失及人口损失的详细图景,从而使人们对浙江省抗战损失能够有所直观把握,对作者所立意探究的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滞碍作用,也有一相对精确、形象的理解,初步解决了浙江省抗战损失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其与寥寥数语的定性交待相比,意义无可同日而语。

结合量化研究、区域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抗战损失相关问题虽然不能一次性地完整地得出最终结论,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切实步骤,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可以置疑因时空隔阂、相关参数运用及作者搜集资料的局限而得出的结论的绝对精确性。如作者在研究得出浙江省战时直接死亡人口最低限数为 20 万人之后,简单套用美西战争中间接、直接死亡人口比率 5.2:1,估计浙江省抗战期间间接人口死亡数在 100 万人以上,似乎有些草率。笔者在研究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时,首先肯定了袁成毅教授研究得出的浙省战时直接损失人口 20 万人的最低限数。同时,笔者通过考察比照浙江省与相邻省境的战争规模烈度、沦陷程度、人口密度等,建立相关参数模型后认为浙江省抗战八年直接死于战争灾害的人口至少在 46 万人左右;浙江省 1945 年人口统计数较 1937 年人口统计数绝对净减 157.3 万人。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数字全部为人口死亡数,其中应包括为避战祸流难后方、因战争状态下人口自身再生产能力下降而导致的出生数降低量及战争间接人口损失数。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则袁教授利用其考察所得浙江战时直接人口损失最低数结合利用美西战争直、间接人口损失比率估计该省战时人口绝对死亡约 120 万人的结论,似乎有待进一步论证。另外,书作者在总结抗战时期浙江省财产损失时,以 1945 年 12 月美金与法币的比价 1:20 将“有据可考的公私财产

直接损失”法币 8301 亿元,折成 415 亿美元,也颇有令人置疑的地方。法币币值在抗战期间发生过巨幅度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调制的战时全国物价指数表,以 1937 年 1 至 6 月为基期,指数为 100,则战时全国趸售物价指数 1941 年底为 2111,至 1945 年 7 月为 235922;全国零售物价指数 1941 年底为 2147,至 1945 年 7 月为 261913。法币在抗战期间贬值是十分严重的。1941 年底,民国政府官方即曾商定美元与法币汇率为 1:20,但此汇率只是官方汇率,而在实际的外汇交易中没有任何参照价值。由于法币持续不断的大幅度贬值,至 1944 年底美元与法币的市值比价已跌至 1:570,至 1945 年 7 月间在后方城市曾跌至 1:3150。抗战结束后之初期,法币的币值依旧变动不定,总体仍呈贬值之势,故 1:20 的美元与法币的比价,能否反映法币的实际价值,实在有些令人担心。因此,《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的结论部分把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浙省抗战八年财产损失的数额,以此比价折算 1945 年底的法币价值,以笔者来看,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作者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及作者基于其掌握的资料而得出的“初步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同样,我们也无法否认该项成果对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与启示作用。我们期望在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内能够出现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构建起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与前提。

(作者卞修跃,196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荣维木)